

# “劳动”范畴的嵌入与五四时期社会思想的演进<sup>〔\*〕</sup>

——对五四时期社会思想演进的学理考察

吴汉全

(杭州师范大学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想发生言说重心下移的重大变动,最突出的乃是“劳动”观念得以有机地嵌入五四时期的言说系统中。“劳动”作为政治范畴,嵌入思想界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仅有“劳工神圣”思想语境的有力支撑,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引入所引起的社会价值观的提升,遂而使“劳动”作为全新思想意蕴的范畴,而植根于五四时期思想观念和言说系统中。这进而又引发五四时期思想观念的后续性的变革,于是诸如“群众”“群众运动”“新社会”“社会主义”等观念在思想界也就盛行起来。

〔关键词〕“劳动”范畴;劳工神圣;阶级;社会思想;五四时期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5.02.015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故而时人亦深深地感知到“近来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sup>〔1〕</sup>五四时期社会急剧变动必然引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而“劳动”范畴在思想界的有机嵌入乃是最为突出的表征之一。中国学术界对“劳动”问题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很少见有专门研究五四时期“劳动”观念在中国的引进及对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影响。<sup>〔2〕</sup>本文基于对五四时期思想资料的解读,在提示五四时期“劳工神圣”语境的基础上,重点地梳理“劳动”范畴嵌入思想界的历史脉络,同时亦就其对社会思想演进影响的具体层面略作评说。

## 一、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语境

“劳动”作为政治范畴在五四时期成功地嵌入中国思想界,是以当时业已存在的“劳工神圣”的思想语境为前提的。学理上看,“劳工”与“劳动”是密切关联的,甚或可以说,“劳动”是以“劳工”为载体的,故而理解“劳工”乃是理解“劳动”的重要条件。而就当时思想界实存状况来看,思想界如果未有“劳工神圣”的理念,就不可能使社会上有“劳动”价值的认知,更不可能彰显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故而,在解读“劳动”范畴的意蕴时,需要依据历史研究的路径和社会演进思路,先就五四时期的“劳工神

作者简介:吴汉全,法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专项中国历史研究院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研究”(23VLS004)的阶段性成果。

圣”语境给予分析。

“劳工神圣”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形成其“语境”，乃是与当时的“社会改造”话语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早在1918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创办的《劳动》月刊中具有发刊词性质的《劳动者言》一文，就公开宣布其办刊宗旨是“尊重劳动”“提倡劳动主义”，藉以“促进我国劳动者与世界劳动者一致解决社会问题”。<sup>[3]</sup>可见，《劳动》月刊的创办及高度关注劳动问题，乃是与“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的。《劳动》月刊“虽然没有使用‘劳工神圣’一词，而实际上已宣传了这一精神，比在欧战结束后才提出这一口号的蔡元培要早得多”。<sup>[4]</sup>蔡元培在“一战”结束的时候认为，世界将发生重大的变动，“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故而提出了“劳工神圣”口号藉以欢呼“劳工世界”的到来，这不仅对于中国知识界的价值观指向有着引领性的意义，而且也有助于引导劳工走“自食其力”“合群互助”的道路。<sup>[5]</sup>蔡元培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sup>[6]</sup>蔡元培基于“一战”后乃是“劳工世界”的新判断，提出了思想认识上的新要求，这就是“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同时，蔡元培对“劳工”的范围作出新的诠释，使得“劳工”突破了原有的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劳工”这个范畴的边际被无限地扩大了。<sup>[7]</sup>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1918年的几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曾联系“劳工主义”“劳工社会”等范畴来诠释“劳工”的意义和内涵，将“劳工”从社会生活中一般劳动者的地位推进到社会的政治层面，并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历程紧密联系起来，集中地说明“劳工”因为拥有巨大势力而自成“劳工社会”，强调“劳工”乃是运用“社会革命”手段推进社会制度变革、反抗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力量，因而“劳工”乃是“一战”后开启“世界改造”这个“新纪元”的决定性因素。李大钊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sup>[8]</sup>这里，李大钊在“生产力”视域之中使用“新纪元”这样的特定范畴，藉以表达“劳工”在历史演变中所具有的开辟“新纪元”的历史地位。应该说，李大钊对于“劳工”的诠释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演变，彰显“劳工”开展“社会革命”的伟大力量，这与思想界一般地使用“神圣”一词相比，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意蕴和学术价值。

“劳工神圣”对于五四时期思想界有重要的影响，与中国思想界对于“五一节”的热切关注密切相关。早在1918年的“五一节”之际，《劳动》即发表《劳动节》文章，认为工人阶级的“五一节”乃是“社会史中不磨之纪念”，盖“资本制度之破坏，私产社会之蜕化”及“劳动家一跃而登于合作共产之新天地”，“胥于是日肇其端”；<sup>[9]</sup>该文还认为，八小时工作制不是劳动节的目的，而是为准备工人阶级直接掌握生产机关所进行的准备，因为工人阶级的斗争“以联络互助为作战第一步，以增殖成时为作战第二步，以劳动者自身直接管领生产机关，生产物公平分配为最终目的”，<sup>[10]</sup>故而“劳动节”乃是工人阶级战斗的步骤。可见，中国思想界最早关注并解读“劳动节”乃是在“社会改造”的认知中进行的，不仅具有变革社会的政治诉求，而且也表现出关注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并赞颂阶级斗争手段的鲜明态度。

中国思想界在1920年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节，《新青年》《星期评论》《北京晨报·副刊》《觉

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都出了纪念专号,不仅进一步宣传了劳动的价值与意义,而且积极推进了“劳工神圣”理念与中国“社会改造”话语的有机结合。此种情形,诚如李大钊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sup>[11]</sup>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为例,该刊上有的文章强调“五一节”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进行“社会改造”,指出:“五月一日总同盟罢工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要求减少工作的时间——每日八时间的工作,他的总目的是在改造社会。……我想,我们要纪念这个日子,不但要追想一追想他的历史,还要承继他的功业。……我们——凡是承认五一运动是为了新世界奋斗的同志——都应当撑起肩来担负这个改造社会的责任,去完成他(五月一日)的希冀”。<sup>[12]</sup>该刊发表的《劳动节的祝词》文章,认为“五一节”的意义就在于使“劳动问题”通过“直接行动”而获得解决,故而“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把从前由资本家掠夺去的生产机关,一切收回社会公有,然后按着自由的原则,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这就是叫做直接行动,这才是近来劳动问题的真意义,劳动节的真精神!”<sup>[13]</sup>该文据此又看出“五一节”所具有的阶级斗争意义,认为“五一节”使“从前所认为空想的阶级斗争竟实现起来”,这样劳动者也就“知道社会革命必不可免,而阶级斗争实是解放无产者的方便法门”。<sup>[14]</sup>这篇文章,将“五一节”的意义解读为“直接行动”和“阶级斗争”,从而使“五一节”成为“社会改造”话语走向激进的革命方式的显著标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思想界在1920年对于劳动运动的高度重视,乃是社会中诸多问题郁积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外国劳动运动都闹得利害”,所以我们就“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陈独秀说得对:“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不应该有劳动运动。我们不能说中国底劳动者境遇不苦恼,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人不应该提倡并帮助劳动运动。”<sup>[15]</sup>就是说,正是因为中国劳动者有着严峻的生存境遇问题,故而也就必然会有劳动运动的发生。鉴于这样的情况,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亦在1920年5月28日致信毛泽东,希望新民学会在“文化运动”之中注入“劳动”的内容,主张在“小学计划成”之后“同时筹划劳动教育”,认为“新民学会所宜注意的,自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并将“鼓吹各种合作运动”、仿照“新生活”来“出一些小册子”、小学中“多收农家子弟”等作为重要抓手。<sup>[16]</sup>

在1920年之后,“劳动”观念逐渐普及于中国思想界,“工读”思潮兴起乃是重要的表征。譬如,《工学》在五四运动后的态度有所变化,注重研究劳工阶级问题,改变了过去的阶级调和的思想,因而其言论也就比较接近于革命的立场。1922年“五一节”来临之际,《工学》复刊时即出了“五一纪念号”,其发刊词写道:“从五一运动的历史看来,最可纪念的是劳工对于阶级的觉悟。他们一方面觉察他们所受的痛苦都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要恢复他们的人权,须取直接行动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专横;一方面觉察他们所以被支配于所谓‘劳心者’,是由于没受过充分的教育,故要求八小时的教育权,警醒智识阶级的迷梦。我们对于他们牺牲精神和团结的坚固,应表十二分的同情。我国现在虽没有大资本家的组合,但工人所受的痛苦,却比欧美的工人尤甚。资本主义是国际的罪恶,我国当然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果我们现在不设法扑灭,他的势力一步一步的侵入,加以军阀和知识阶级的助虐,将来的牺牲可大了!我们为国际的同情起见和我国的工人设想,都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们一方面将国际工人运动介绍给我国工人,以促他们的觉悟;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的罪状,使我国野心家知所警戒,不敢为所欲为。劳工运动是没有国际的区别的,工人们大家起来照着干吧!”<sup>[17]</sup>这个“发刊词”有几个显

著的地方:一是将“阶级的意识”作为“五一节”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强调劳工的阶级意识提升的极端重要性,故而一方面要认识资本主义的罪恶,并采取“直接行动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专横”;另一方面也要“觉察”工人阶级自身的状况,这就是“没受过充分的教育”。二是主张立足中国的情形来研究劳工阶级,认为尽管“我国现在没有大资本家的组合,但工人所受的痛苦,却比欧美的工人尤甚”,又由于“资本主义是国际的罪恶,我国当然不能不受其影响”,故而提出现在就要立即来研究劳工问题,寻求“设法扑灭”资本主义罪恶的办法,以免将来可能出现大的“牺牲”。三是在国际视域中研究劳工问题,认为“劳工运动是没有国际区别的”,因而需要“将国际工人运动介绍给我国工人,以促他们觉悟”,并号召“大家起来”而付诸行动,沿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照着干”。<sup>[18]</sup>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立言,颂扬工人“牺牲精神”和“团结的坚固”品质,反对资本主义并致力于“打破资产阶级的专横”,乃是《工学》上这个“发刊词”的显著标识。可以说,中国思想界通过对“五一节”的宣传,使得“劳工神圣”与“社会改造”之间构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因而也就推进了“社会改造”话语的形成。

中国思想界在“劳工神圣”语境之下,逐步形成“尊重劳动”及“尊劳主义”的思想理念。“劳工”之所以“神圣”乃是因为劳工的“劳动”创造价值。由于思想界对“劳动”的高度尊重,必然凝聚为“尊劳主义”的思想认知,这在“五四”前的中国思想界即已形成,这对于“五四”后“社会改造”话语的兴起有着关键性意义。《劳动》第1号发表的《尊劳》文章,申明劳动的价值和尊重劳动的重要性。该文认为,从伦理上说“人而劳动,即所以尽人生最大之任务,盖劳动为文明之渊源,社会所赖以生存者”;从经济上说,以社会主义观点看待生产的三要素,“只有‘劳动’实为生产之根源”,“无劳力则生产无由进步”;从道德和卫生上说,勤劳不仅能免于道德败坏、助益长寿,而且还能锻炼意志品质,故而“古今中外之能建立大功、提挈一切者,罔不具大精神大魄力,要皆从劳苦中锻炼出来者也”。正因为“劳动具有无上价值,道德之所不能遗,卫生之所不容已,大之以振拔精神,磨砺志气,小之亦借呈活泼,免陷颓废,此君子所以尊劳也”;又因劳动乃是生产的根源,故而“准此原理,故劳动者当直接享有生产物,于以成其为社会主义,不劳动而享有者,是谓掠夺,所当排除,于以成其为社会革命”。<sup>[19]</sup>《尊劳》文章的主旨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具体地阐明其“尊劳”的理由,并将“尊劳”凝结为一种思想态度和精神上的价值观,表征着“尊劳主义”的思想内涵,尽管还没有使用“尊劳主义”这个范畴;二是在对“尊劳”的解读和阐释中,将“尊劳”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因而也就赋予“尊劳”以社会改造意蕴。时隔一年,李大钊在1919年3月发表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文章中,即鲜明地提倡“尊劳主义”,主张在劳动的人生乐境中实现自我价值,从事社会的改造事业。在他看来,要获得求乐的人生观,就必须发扬“尊劳主义”,通过劳动来获得物质上的财富、精神上的解脱、生活上的乐趣,从而在展示人生价值的同时实现人生的价值。他说:“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sup>[20]</sup>何谓“尊劳主义”?李大钊说:“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苦痛了吗?”<sup>[21]</sup>李大钊不仅阐发了劳动的价值及思想上的意蕴,而且提出“尊劳主义”范畴,藉以倡导“尊劳主义”对于人生以

及社会改造的重要意义。“五四”后,“尊劳主义”在进步青年中得以发展。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长经亨颐的领导下,依据民主主义精神和时代要求在学校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崇尚劳动,支持学生创办社团。校内学生就组织了两个“劳动团”,其共同发布的宣言中,一方面坚信“未来的社会,人人应该从事于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重点阐发劳动对于人生的价值和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指出:“无论哪一个人要生存,就要有衣食住的供给。衣食住从那里得来?都是劳动的结果。那么,就可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生”;“劳动是神圣的事业,是人生必尽的义务,所以力所能及的,就要切实的去实行”。<sup>[22]</sup>后“五四”时期对于劳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并成就其“社会改造”话语,应该说是奠定在“五四”前业已形成的“尊重劳动”及“尊劳主义”理念的基础上。

从考镜求圆、探寻本源的研究路径出发,“神圣”二字在五四时期之所以用在“劳工”身上,就颇值得研究者进行语义上的梳理。经过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诸多的偶像被推翻了,不仅封建的君权神授观念没有存立的市场,而且原先作为正义化身的资本家形象亦黯然失色。此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皆受到怀疑,一切都得经过理性法庭的裁定。在此情形下,为何原来一直未引人注目的“劳工”,现在却可以拥有“神圣”的荣冠?从社会的价值体系来看,这与社会中既有信仰体系走向崩溃是分不开的。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可能在寻求新的信仰对象的过程中,逐步地将目光聚焦到“劳工”身上,从而形成“劳工神圣”的信仰体系。问题是,“劳工”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乃是社会生活中的“体力劳动者”,在信仰体系转型之中并不拥有思想言说中的话语权,亦即“劳工”本身此时并不能赋予自己以“神圣”的荣誉,而只能由五四时期的新生代知识分子所代言,并赋予其“神圣”的地位和声望。接着的问题是,新生代知识分子为何能够抛弃其先辈的信仰目标而远离既有的政治权力中心,在社会结构中寻找新的信仰对象,从而将言说目标下移民间并进而关注社会底层的“劳工”呢?这当然还得从新生代知识分子本身来分析,并联系社会中思想变动所给予的实质性影响。进而言之,“神圣”的荣冠在五四时期加诸“劳工”身上,则作为“当事人”的“劳工”显然是不可忽视的主体性存在,其在社会生活及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到底处于何种境地、发挥怎样的作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也就成为需要重点回答的问题。因此,“劳工神圣”不仅是一个关系社会信仰体系和价值观衍化的问题,而且也是直接地关涉“劳工”在社会衍化中所处的实际状态问题,同时也是牵涉新生代知识分子崛起的问题。

## 二、“劳动”范畴在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成功嵌入

在五四时期“劳工神圣”语境中,进步思想界考察“劳动”问题时,并没有停留在对“劳动者”的赞颂上,而是紧密地联系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具体情形,进而分析“劳动”方式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这样,经过进步思想界的诸多努力,“劳动”作为思想性、政治性的范畴,其意蕴与价值在中国思想界也逐步被认可。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劳动”的研究,特别是阐发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和意义,为“劳动”范畴在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成功嵌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而马氏的“余工余值说”(亦即“剩余价值学说”),皆是“从他那‘劳动价值论’演出来的”。<sup>[23]</sup>又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故而“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sup>[24]</sup>陈独秀也说,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

值如何定法”，这就要弄清楚“劳动价值也分为二种：劳动力自身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拿若干工钱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价值；劳动产品之价值，即是劳动者每月做出若干生产品之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自身也是一种商品，所以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底价值，乃是由培养他所需的劳动分量，也就是制造劳动者及其家族生活品所需的劳动分量而定。’”<sup>[25]</sup>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需要指出的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与唯物史观的宣传联系在一起。如李大钊就说唯物史观使我们“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sup>[26]</sup>这就进一步说明劳动的意义及劳动者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性地位。

五四时期的进步刊物顺应时势地将劳动问题研究作为一个重点，这是思想界一个可喜的现象。以《劳动者》为例，这个刊物当时研究劳动问题很有影响，特别注意到劳动者的“劳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它一方面在歌颂“劳动神圣”时，高扬社会中体力劳动者的崇高地位：“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劳动者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就是“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sup>[27]</sup>这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劳动者同时又面临着悲惨的境地。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悖论呢？其原因就是，劳动者尽管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这种财富已经“都被富人夺取”了，因而这“实在是天地间最不平之事”。<sup>[28]</sup>这实际上是提出劳动者伟大与劳动者生活悲惨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就是探究劳动者的劳动何以又出现了劳动的“异化”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源自于社会制度：“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sup>[29]</sup>因此，只有通过“社会改造”来变革既有的社会制度，使得“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sup>[30]</sup>当时，不仅《劳动者》重视劳动问题的研究，《劳动界》对于劳动问题的研究也很有见解。《劳动界》中的文章也说，做工的人“倒反不及那般坐吃的资本家有那样好的衣穿，好的吃食，好的房子住，好的器具使用；我们有时还要一碗糟米饭倒没有吃”，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去了！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sup>[31]</sup>这也就是说，劳动者之所以不能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在于社会上有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缘故，故而有钱的人能够“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去”并以此“来压制我们”。<sup>[32]</sup>当时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有文章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其劳动，所以人们“应以劳动为生活的第一义”，而“如果不劳动的话，那就不能算他一个生人，就象一个死人”。<sup>[33]</sup>这里，不仅将“劳动”视为社会中“生活的第一义”，而且将“劳动”作为是否为人的根本标准，这在价值观层面对“劳动”进行定位及其对“劳动”所表现出的尊重态度，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确实非同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问题不仅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动者》《劳动界》等著名的“劳动”类型的杂志所重视，就是地方的一些刊物对于“劳动”的认知亦达到很高的境界。譬如，《闽星》中的文章说：“由劳动制造的东西应归劳工分配才合道理，然而现今的社会就和这个原理相反，资本家不动手不动脚却将全部的利益收做自己的私材”，说到底劳动者的“困苦和无智都是那社会经济的组织不良的结果”。<sup>[34]</sup>又譬如，地方的《责任》杂志，也认识到人在社会中皆有其责任之所在，不仅“劳动”与“生存”

不可分,而且“劳动”乃是全社会成员所应担负的责任,“人各依自己底能力,负担人已间的责任,一种是生产工作,一种是生产品消费;生产工作,便是劳动,生产品消费,便是生存。有工作才得生存,要生存必须劳动,劳动是责任,生存也是责任,这两重责任,为人都应该负担,不是那个人该负担劳动责任,那个人该负担生存责任。”<sup>[35]</sup>但是,由于任何“劳动”皆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而社会关系则是制约劳动的主要因素,由此也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劳动”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为此,《责任》杂志上刊载的《现在的社会》一文,专门分析“劳动”所处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不平和劳动者被压迫的原因,指出:“现在的社会,完全是资本家的社会,……社会上所以会有资本主义,而能造成许多资本家,实在由于私有经济制度的罪恶”,故而“非先革除私有经济制度不可”;并且在“私有经济制度”下“其他的一切制度,现在存在的,都非革除不可”,这就需要“所有的无产者,大家要团结起来,去做社会改革的实际运动”。<sup>[36]</sup>这可见,有关“劳动”的研究不仅引起思想界的普遍关注,而且业已在思想界形成其话语权。

随着“劳动”范畴嵌入思想界并形成尊崇“劳力”的言说系统,尊崇“劳力”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之一,至少在进步知识分子中都不得贬低“劳力”的地位。《星期日》高扬“劳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主张对于社会中的“劳力”与“劳心”要作出平等的认知,认为这“两者不过为形式上的区别,而实际上还是一样的——没区分的——平等的——没贵贱的。一些不明事体的人,认精神劳动比肉体劳动高贵,那就是根本的错误”。<sup>[37]</sup>由此,该刊对于社会中那些不劳而获的寄生群体予以猛烈抨击,指出:“你看那些伟人——贵族——纨绔儿,那一个不是吃安乐茶饭的,只晓得分利,不晓得生利。我们的社会,弄得来麻木不仁,万恶丛生,都是这些好吃懒做的强盗造成的!”<sup>[38]</sup>关于何谓“劳动”的问题,当时亦有文章说:“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又说:“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故而也就有“劳工神圣”口号。<sup>[39]</sup>就语义来看,所谓“劳力”皆是与“劳动”这种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劳动”这种方式就不可能有“劳力”;而所谓“劳力”就是“劳动力”,它是“劳动”的载体,具体所指的乃是社会中的体力劳动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工”。在五四时期的话语中,作为社会财富象征的“钱”固然尊贵,但“劳力”与“钱”相比则更为尊贵了,因为“如果没有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钱是没有什么尊贵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上海地方钱是很多的,但是,如果那几十万的工人都罢工了,工场也不能出东西了,粮食也不能进来了,我怕上海的人都要饿死在钱堆里面呢!”如此来看,“如果说钱尊贵,劳力就比钱更要尊贵了”。<sup>[40]</sup>这里意思是说,“钱”尽管是财富的结晶或表征,但如果失去“劳动”这个创造财富的本源,则所谓的“钱”什么也不是。民间社会中的话语尽管简单而又朴实,但其所表达的崇尚劳动的价值观却是十分清晰的。

当时,有不少进步的社团要求成员高度尊重社会中劳动者的成果,做一个有助于社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譬如,湖南自修大学不仅强调“劳力”在社会中的“主人”地位,而且将“劳动”视为人生所必备的能力,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有机结合,并在校内设置园艺、工厂给学生以劳动的锻炼。《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二十一条有这样的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sup>[41]</sup>又譬如,《觉悟》上有文章说:“我们每日享受那物质的文明,还是靠着‘劳工’,因为没有劳力的人工,什么文明都不能成就,什么幸福都不能享受。”<sup>[42]</sup>再譬如,当时江西的改造社要求社员“打破学生超人的幻想”,要求“明白学生是个人,是个国民,比他们并不多长二个头,六条臂膀”,要认识到“劳动是天然的职分”“平人是为人的信条”,那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则是“田亩上的

农夫、工厂里的劳动者”。<sup>[43]</sup>“劳动”是当时新知识界常用的新词汇,这固然受“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源自新知识界本身对于“劳动”新的认知。故而,当时的新知识界中有人对于“劳动问题”不为社会所普遍关注,而仅为少数新文化人所重视的现象,表示出严重的不满。《曙光》创办者王统照说:“自从欧战完了以后,‘劳动’二字,已竟在世界上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名辞。一切事务,大有惟劳动者的‘马首是瞻’的样子。可怜的中国人尚在睡梦里,只是成日里醉生梦死、攘权夺利的忙个不了,谁有工夫去过问这些事情。除了几个从事文化运动的以外,谁还不是对于这样关系的大问题熟视无睹呢!”<sup>[44]</sup>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非常盛行的工读主义思潮亦加入了尊崇“劳力”的行列中,这对于尊崇“劳力”思潮的发展应该说也是有所贡献的。从源头上分析,工读主义思想在“五四”以前即已出现,《劳动》月刊就曾认为工读主义是未来社会的理想,这当然是在“尊重劳动”中倡导“工读”的。《劳动》上发表的黄凌霜《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文章,更明白地说:“将来社会进化,达至如何地步,虽不可得知。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当社会,有可预料。”<sup>[45]</sup>天津真学会创办的《新生命》是五四时期宣传工读主义的刊物,不仅重视劳动问题的研究,阐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而且还认为劳动者之所以终日劳动而不得温饱、落入受压迫和剥削的境地,就在于有制度不合理的旧社会,故而主张依据俄国革命的方法,推翻现行社会藉以解决劳动问题。该刊的一篇《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文章说:“近来劳动界都已觉悟了,所以每次罢工都是要求缩短作工时间,增加工价,劳动界的痛苦虽比从前减少些,但并不是根本的解决,什么是根本的解决呢?有俄国为先例,……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先锋。”<sup>[46]</sup>这不是一般的反映劳动者疾苦的问题,而是将劳动问题的解决最终归结于社会制度的改造,并希望以俄国革命的办法,在中国进行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从而使劳动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就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看,“劳力”与“劳心”向来是对立的两厥,故而有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因此,“改造社会”就需要“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使社会上劳力的工人都去求学——要求高深的学问,求学的人都去作劳力的工”,<sup>[47]</sup>这应该说是工学会成立的重要理由。1919年5月3日正式成立的工学会,尽管没有北京工读互助团那种与旧社会决裂的思想,但在提出“工和学并立”主张的同时,也希望“作工的人一定要读书,读书的人一定要作工”,并认为无论在“人生需要上”“国民生计上”还是在“教育预备上”“人格完成上”,“劳力”皆是“不可不实行并且提倡的”。譬如,在人生的需要上说,“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屋、供我们使用的器具、令我们快慰的物品”等等,“没有一种不是从劳力得来的”。又譬如,在国民生计上说,中国之所以“民穷财尽”就是因为“劳力的人太少的缘故”,故而要使“国家一天一天富起来”“生利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那就“非实行并且提倡劳力不可”。再譬如,从人格完成上说,“要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先要能够独立生活。要想独立生活,非劳力不可。”<sup>[48]</sup>工学会将“工”和“学”结合起来,并寻求调和“工”与“学”两者的对立与紧张关系,显然是受到当时社会上“劳工神圣”思想的重要影响,故而关于“工学主义”涵义有这样的解释:“劳工是神圣的,求学也是神圣的。劳工是维持并发展我们的生活必要的,求学也是维持并发展我们的生活必要的。劳工是促进世界文化达到人类最大目的的手段,求学也是促进世界文化达到人类最大目的的手段。劳工是与我们生命相终始的,求学也是与我们生命相终始的。劳工与求学是我们人类上天堂的一条铁路的两条铁轨,一个车子的两个轮子。我们的一生,除了吃饭、穿衣、睡觉、游嬉以外,并应该只有这两件事。不是去劳工,便要去求学;一面劳工,一面求学。就是吃饭、穿衣、睡觉、游嬉,又何尝不应该为着这两件事。工学主义的第一义,便是认定人生只有工与学两件事。”<sup>[49]</sup>概而言之,工学会持有“劳工神圣”的思想理念,因而也



就高度重视劳动在消解“劳工”与“求学”对立中的意义,并十分强调“劳力”的极端重要性,其平民化的思想境界乃是比较显著的。

当时不少社团尽管在性质上不属于工读团体,因而也不是专门倡导“工读主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工读主义”的倾向,并着力于通过调和“工”与“读”的对立和矛盾来体现其“平民化”理念。天津的觉悟社重点地宣传个人“觉悟”的理念,但也有“工读主义”的热切期待,如《觉悟》上有篇2万字的《工读主义》文章,说“工”是指“劳力的人”,而“读”则是指“劳心的人”,“劳心”表现为“运用他的脑思去主使一切动作”,“劳力”表现为“运用他的五官百骸去发生一切动作”,但“工”与“读”在社会中又是相互联系而“一同去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的,因为“人类的进化,是由‘工作’集成;成‘工作’的要素,知识是一个主要条件”,于是“我们要多促进人类进化的‘工作’,我们必须得有充分的知识”,故而在社会改造之中“人人应当‘工作’,人人应当接续不断的‘读书’”。<sup>[50]</sup>这里虽没有多少赞扬“工”的言语,但力图调和“劳力”与“劳心”之间的对立并表现出高度重视“劳力”的理念还是很特别的,其特别之处就是这里的所谓“工”(劳力)乃是践行“读”而具有现代知识的“工”,而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必须要有向“工”的方面努力的目标。

概而言之,“劳动”观点嵌入五四时期的思想界乃是一个不断行进的历史过程,以业已形成的“劳工神圣”语境为条件,不仅在内容上高度重视劳动意义与价值,彰显劳工主体性的社会地位,而且在行动上亦表征出先进知识分子力图调和“劳力”与“劳心”之间对立的努力,这使得五四时期思想观念下移的特征更为显著了。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可喜的大变化。

### 三、“阶级”观念的引入与“劳动阶级”范畴的提出

探讨“劳动”范畴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嵌入,还应该看到“劳动”在思想内涵和价值观方面的突出性变化。这就不能不注意到“阶级”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引入及其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以下,试就“阶级”与“劳动”结合后,所形成“劳动阶级”的这个范畴,作简要的分析:

五四时期以“阶级”来划分社会成分,在五四运动之后的思想界得以流行起来。这是阶级意识在思想界中得以普遍增长的显著表征。五四时期的王光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的影响。他说:“现代学者把世界上人类分作三种阶级:(1)智识阶级;(2)劳动阶级;(3)资产阶级。我们理想的社会是无阶级的,智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同时便是资产阶级。但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制度之下,这三种阶级还是有的,我们学会的主张既不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当然要从现代社会下手改造。我们以为应该要从这三种阶级里寻出有觉悟的人,使他们三个阶级的人互相接近,以实现我们的理想社会。”<sup>[51]</sup>这段论述,表现出王光祈在社会改造中理想性的一面,但亦可以看出王光祈承认“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以阶级的观点来划分社会中的各个分子,故而也就有了“智识阶级”“劳动阶级”“资产阶级”的提法,尽管他此时提出的“从这三个阶级里寻出有觉悟的人”主张具有极大的空想性。

五四时期的不少刊物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是普遍而不是个例。在广州,于1919年下半年创办的《民风》周刊,虽然主要负责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梁玄冰(在《民风》上以“两极”的笔名发表文章)、区声白等,但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很显然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某些影响,尽管这些文章的作者不一定就主张“阶级斗争”。如该刊上1919年8月发表的《“长衫”应届末日》文章,以“阶级”的观点考察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群体,认为“长衫”乃是统治阶级的标识,提出“弃长衫用短衫”的主张,指出:“长衫最大的罪恶,深藏在骨子里头,不知不觉中,造成社会阶级的观念。穿起来

便是绅士、是读书人、是大人老爷少爷、是‘劳心者治人’的好宝贝、是‘坐不垂堂’的好物儿、是东方的Gentleman。”<sup>[52]</sup>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也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工读主义”，但这里的“工读主义”亦受到阶级观点的某些影响。譬如，该刊发表的《我的工学主义观》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产生两个阶级：生产的阶级“专用体力，消费很少，做得不好，因为他的脑子停着不动”；消费的阶级“不能生产，他有待生产者思想的权利，想得不好，因为他同手工分离”。而他们宣传“工学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两个阶级的区别，“把智力同体力沟通，做工的可以求学，求学的也许做工，管机器的能自己造机器，做农务的也许操工业上的操作，——如此，轮流变换，不守故常，使个人的能力，在各方面尽量发展出来，于社会较分工更为有利——这便是‘全工’。”<sup>[53]</sup>一般说来，当时主张改良社会的青年人，尽管也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影响，但大都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只是试图在既有的制度架构中实现点点滴滴的改良，但有时也不尽然。譬如，浙江永嘉学会出版的《新学报》所发表的《破除社会的阶级》文章，认为阶级是社会的万恶之源，因而是必须加以“破除”的，而中国社会中的阶级亦可以分为“官僚阶级”“绅士阶级”“文人阶级”“有产阶级”“男子阶级”这五个“阶级”。<sup>[54]</sup>这种分类固然是不符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并且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有着很大的误解，但其言论很显然也是受到阶级观念的某些影响。

五四时期思想界关于阶级对立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对范畴上，“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也就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划分社会阵营的主要依据。在五四时期的期刊中，进步青年已经认识到社会中有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严重对立，并力图以阶级的观点来解释这种对立。譬如，1920年6月1日创刊的《自治半月刊》尽管对于社会改造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但其发刊“宣言”亦表现出“阶级”的意识：“世界上所以有不平等不自由底事情，无非是为着有治者和被治者底阶级。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治者和被治者底阶级？无非是因为一部分人放弃他自治底责任，其他一部分底人，就从而庖代了。”<sup>[55]</sup>这里，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形成归于“一部分人放弃他自治底责任”固然是不正确的，但亦看到社会上存在着“治者阶级”和“被治者阶级”的现状。又譬如，1923年4月创刊的《女星》倡导“革命思想”，指出：“凡稍有革命思想的人们，必都知道要援助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劳动者供给人类的衣食、住，反被人摧残、侮辱，谁都应该明白这是不平等的事情。”<sup>[56]</sup>不难看出，在五四时期的社会话语中，“被压迫者”是指劳动阶级，“压迫者”一般是指“资本家阶级”，但在中国的状况下，这“压迫者”还包括“世界资本主义”。再譬如，《新民意报副刊》中有篇《本刊今后的趋向和任务》文章说：“由机械的发明，造就了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掌握全部生产的劳动者，反被压迫于资本家的底下，这是怎样的不平而可怜呵！尤其是中国的劳动者，一面受国内资本家的压迫，同时又受世界资本主义的侵掠，以致一天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收入还得不到维持一人的生活，这是何等的残酷呵！”<sup>[57]</sup>就五四时期思想状况而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对范畴之所以比较频繁地出现在五四时期的话语中，并进而成就五四时期的革命话语体系，是因为中国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严重对立，故而也是这种对立的社会状况的思想反映，但同时也有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理论的宣传所形成的思想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就对“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关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他指出：“人类社会因治生方法不断的进步，他们经济的及政治的组织遂随之不断的进步。在这不断的进步之过程中，保守者与改革者亦即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两方面，自然免不了不断的争斗；每个争斗的结果，后者恒战胜前者，人类社会是依这样方式进步的。”<sup>[58]</sup>可以说，陈独秀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诠释社会的阶级结构，展示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中国所形成的严重对立，这对年轻一代进步者有着思想上引领的作用，并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的革命话语体

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在阶级观念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之后呈现思想重心下移的发展态势,其重要的表征就是在“劳动”与“阶级”这两个范畴的结合中提出了“劳动阶级”这个范畴,藉以说明“劳动阶级”所具有的阶级属性及其在中国社会运行中所应有的主导性地位。这是阶级意识在社会上和思想上得以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表征。

五四时期话语中的“劳动阶级”是由“劳动”与“阶级”这两个范畴结合而成的,而“劳动”这个范畴的价值意蕴也在阶级观点注入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观诸五四时期的相关文献,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的解读,大致皆是与“劳动者”地位的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劳动”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陈独秀认为,劳动者在社会中乃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因而对于劳动者本身来说,也就必须形成“劳动者”的阶级认同和身份认同。由此,“劳动者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因为他们本来都讨厌劳动者,若是一旦低头来和劳动者接近,必定有所利用”;同时,“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那些“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权利的,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至于无政府党,尽管其宗旨有着革命性的一面,但“他们太过看重个人的或小团体的自由,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故而“劳动者也不宜相信他们”。因此,“劳动者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急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sup>[59]</sup>可见,陈独秀是从劳动者的阶级认同的角度来揭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并指明了“劳动者”在对待政党问题上,必须采取“亲近”共产党的方略,藉以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其政治上的目标——“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这同时也说明,以“劳动”为特征的“劳动者”具有相同的阶级地位、思想认知和行动目标。

以上基于对五四时期思想话语中“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的考察,不难看出“劳动”这个范畴在五四运动以后得到全新的诠释,并在“阶级”叙述话语中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和内涵。也正是在这样的“劳动”观念基础上,“劳动”得以有效地与“阶级”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劳动阶级”这个范畴。陈独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来诠释“劳动者”,提出了“劳动阶级”范畴所应有的内涵,指出:“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工,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sup>[60]</sup>陈独秀不仅提出“劳动阶级”的范畴,而且阐明了“劳动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18世纪是“新兴财产工商阶级”的时代,而20世纪则是“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时代,他们“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sup>[61]</sup>陈独秀在《谈政治》这篇著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还基于“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问题,提出了“劳动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任务:“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等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sup>[62]</sup>在陈独秀的认识视域之中,不仅在社会改造之中要极端重视“劳动阶级”的存在及地位,而

且劳动阶级本身亦需要觉悟起来,明白阶级的使命和任务,这就是要力争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故而他说道:“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sup>[63]</sup>关于“劳动阶级”中的具体类别,陈独秀在为《伙友》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也明确说:“从广义说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的阶级战争的三大军团”。<sup>[64]</sup>“三大军团”主张的提出,乃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团结意识和组织意识的突出体现,其实也就是工人的阶级意识增长的显著表征。这亦可见,《伙友》对于何谓“劳动阶级”是有着确切的思想认知和阶级身份认同的,即凡是“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该刊提出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一对范畴来区分阶级阵营:“劳动者是无产者,生产的;非劳动者是有产的,不生产的。非劳动者这个阶级叫做有产阶级,和劳动者这个无产阶级对峙着。”<sup>[65]</sup>这里,“劳动者”与“非劳动者”所分别对应着的正是“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就清晰地划分出社会生活中的阶级阵营,并表征着“劳动阶级”亦即“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应有的地位;而“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对峙着”,正是说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阶级间的严重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也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所表现出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亦即“只有少数的人在那里安安逸逸享福,多数的人只好在他们底下过枯涩的生活,听他们(按指资本家)使唤,做他们的牛马奴隶”。<sup>[66]</sup>以上例证说明,“劳动阶级”范畴有着独特性的意义内涵,在五四时期思想界具有引领性地位。

下面,试就五四时期“劳动阶级”这个范畴,在学理上再作简要的解读:

其一,从“劳动阶级”范畴的提出者来看,“劳动阶级”范畴首先是由“智识阶级”(或“知识阶级”<sup>[67]</sup>)提出的,其原因是“劳动阶级”本身没有文化并且也不掌握话语权,故而也就不能在政治的意义上提出“劳动阶级”这个范畴。“智识阶级”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时代中提出“劳动阶级”范畴,正是说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本身亦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即由原来轻视劳动者到现在崇尚劳动者的思想转变。从根本上说,这种认识的转变也带来了“智识阶级”的阶级立场的转变,即从传统的依附于权贵阶级到现在服务于社会下层劳动阶级的转变。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及阶级斗争观点影响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形成的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认知,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显著表征。早在“五四”前夕,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的文章中就提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主张,并认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sup>[68]</sup>在五四运动中创刊的《杭州学生联合会报》,就曾“随着世界大势”而“更改”原来的“巩固学生之团结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的办刊宗旨,提出:“根据世界潮流,促进知识阶级和劳动阶级彻底的觉悟,进谋知识阶级和劳动阶级的联合。然后共同破坏现在世界,‘黑暗’‘非理’的强权,建设‘光明’‘合理’的社会。”<sup>[69]</sup>这个刊物宗旨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思想立场从原来的“知识阶级本位”到现在的“劳动阶级本位”的转变。因此,“劳动阶级”范畴的提出,对于“知识阶级”以后的道路抉择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二,从“劳动阶级”范畴形成的路径来看,五四时期以“阶级”观点诠释“劳动”,并进而在对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崭新认知中形成“劳动阶级”的范畴,这不仅突出了劳动者在社会中所应有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在事实上使劳动者进入社会政治生活体系之中,并使之担负起变革社会的阶级使命。换言之,五四时期思想界将劳动者赋予其阶级的性质而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劳动阶级”,也就要求其能够自觉地承担起开展政治运动的使命。这对于劳动者而言,实际上是既表征其地位,又赋予其历史使命或历史责任,并进而求得两者在社会变革实践中的统一性。陈独秀在《劳动周报》(广州)上撰文,专门

阐述“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问题,指出:“劳动阶级政治运动之真义:第一步是为劳动阶级之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自由权利而奋斗,在此奋斗中,不妨与表同情于劳动阶级之民主派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以打倒眼前之敌人,即剥夺工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自由权利之军阀;第二步是劳动阶级自身握得政权,以巩固自己阶级之利益,以防御敌对阶级之反攻,必俟一切阶级消灭,劳动阶级始能停止其政治运动,此劳动阶级政治运动之真义也。”<sup>[70]</sup>陈独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将“劳动阶级”与其所应担负的“政治运动”使命紧密联系起来,并阐释了“劳动阶级政治运动”的“真义”,应该说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劳动阶级”从事“政治运动”的积极期待。这同时也使得“劳动阶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性范畴。

其三,从“劳动阶级”范畴的内容来看,“劳动阶级”范畴在内容上赋予了“劳动者”所应有的阶级责任,以及所要从事的阶级斗争和所要完成的夺取政权的任务,因而也就表征着“阶级的觉悟”的提升。一般说来,日常话语中的“劳动者”本来就是生产者,并且主要是在社会的生产领域进行活动;而当“劳动者”被赋予政治意义成为“劳动阶级”之后,则显然是赋予其政治身份,并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故而也就有其阶级的地位、阶级的责任及所要完成的阶级的任务。谭平山在五四运动后注意到,世界大战之后劳动阶级的崛起及其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乃是世界性的潮流,因而“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互相奋斗旗鼓相当的时候”,“劳动阶级已冲入资产阶级所有的第一防御线了”;然而,由于“世界的军阀,就是君主和资本家的保护人”,故而劳动阶级“正首当这个世界潮流最急之冲”,就应该“先行破灭”这“世界的军阀”。<sup>[71]</sup>可见在谭平山的认识视域之中,“劳动阶级”本身天然地赋予着阶级斗争的使命,不仅现实地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而且也应该有着世界性的革命视域和革命目标,故而认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首先是要努力打倒作为“君主和资本家”保护人的“世界的军阀”。关于“劳动阶级”,陈独秀在《谈政治》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分析,<sup>[72]</sup>将“劳动阶级”置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并从社会政治变革角度来关注“劳动阶级”处于被“压在资本势力底下”这个严峻的现实,故而认为这个“劳动阶级”也就有着使本阶级得以“翻身”的特殊使命,为此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阶级战争”,并造就“劳动阶级”自己的“新的强力”,从而使“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亦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战争来获得政权。可见,五四时期提出的“劳动阶级”这个范畴,不仅是在政治视域看待“劳动”问题,而且也是在阶级斗争语境中赋予“劳动者”特定的阶级使命。这实际上也反映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寻求以阶级斗争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

#### 四、社会思想激进化的演进态势

五四时期“劳动”范畴嵌入思想界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生成了许多新观点,而且带来了思想界相关观念的重大转变,并使整个“五四”思想界出现言说重点下移及思想激进化的演进态势。以下,试就几个与“劳动”相关的范畴略作分析:

1. “群众”观念。“劳动”范畴在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植入,必然使思想界关注重点下移,因为所谓“劳动”乃是社会下层劳动者的劳动,而“下层劳动者”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就是“群众”。就五四时期话语演变来看,随着“劳动”理念在“五四”思想界的植入,社会话语出现了“群众”话语代替“平民”话语的现象,并使“群众”观念在思想界植根下来。就学理来说,“群众”的含义比“平民”还要激进一些,所关涉的社会底层可能还要更为宽泛一点。西方社会学在中国一开始是以“群学”的身份传播开来的,这里的“群”是指社群组织,因而更多是社会层面的意义。在社会学意义上,“群众”更多的是指代社

会上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人群。而“平民”在西方学术界一开始是作为政治学用语出现的,主要指代的是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处于社会下层中的底层民众。亚里士多德就明白地将政治细分为六种具体形式,即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暴君政治、寡头政治、暴民政治,而“平民”则是作为社会中的特殊阶级,是所谓的“民主政治”中的主体,故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平民”也就不是社会下层中的“暴民”。就“平民”在中国流传情况来看,“平民”是随着“平民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开来而逐渐被人们所熟识,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成为“民主”“自由”“平等”的代名词。换言之,“平民”力量的发现在思想的源头上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输入有着紧密的联系,亦即与早期新文化运动以进化论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不可分割。《曙光》创办者之一的宋介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普遍势力”的呈现乃是进化论的产物,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的发展业已呈现出“民主扩大”的趋势,世界也是在向着“德谟克拉西的新世界”进发的,于是“由少数人的特殊势力,进到较多数人的特殊势力;由较多数人的特殊势力再进到最大多数人的普遍势力,这是社会进化自然的趋势”。<sup>[73]</sup>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平民”用语逐步地转化为“群众”用语,于是“群众运动”这个词也在五四时期普遍起来。而对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分子来说,以“群众”来替代“平民”、以“群众运动”来替代“平民运动”,大致是一个基本的趋势。譬如,李大钊在1918年宣传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中,并没有说十月革命是“平民运动”,而是称赞俄国十月革命所采用的“群众运动”方式,并揭示其所具有的“群众运动”的意义,不仅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而且还说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性的“群众运动”的新时代,“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碍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sup>[74]</sup>这说明,在李大钊的早期话语体系之中,“群众运动”不同于“平民运动”,俄国十月革命是“群众运动”,而不是所谓的“平民运动”。当然,对于五四时期的有些知识分子来说,“平民”与“群众”这两个语汇并不作严格的区分,互用并互为指代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譬如,沈玄庐在1919年8月17日发表的《前途的灯》文章中,认为社会必须“力图改革”,但所谓的“改革事业”既不能“假手于军人的武力”,又不能“假手于政客的手腕”,而只能依靠“平民”的力量,也就是“群众”的力量。该文指出:“吾们既将军人和政客都撇在改革事业之外,改革的目的能达到与否,就看平民的力量如何?平民的力量,便是以完全生存技能的各个人,成一个大组合,合起来是能独立能自立的个体,分散了也是能独立能自立的个体。改革成功的酬劳,就是大家得均等享受的幸福。……光明世界在何处?从何寻找得到?要由群众自己建设的。”<sup>[75]</sup>这可见,在沈玄庐五四时期的言说中,“平民”就是“群众”,“群众”也就是“平民”,亦即对于“平民”与“群众”这两者并不作严格的分别。但是,从观念演变和学理方面来分析,不仅“平民”与“群众”有着不同,而且“群众”的意义性内涵既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群众”观在中国的传播有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运动群众性的斗争方式有着某种关联,故而“群众”在思想内容上大致比“平民”也要丰富得多、激进得多。

2. “群众运动”观念。劳动尽管是个经济学的概念,但同时也是政治学的概念,故而必然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由此,劳动观点在“五四”思想界的植入和尊重劳动风气的日渐形成,不仅使思想界对“群众”这个群体高度地重视,而且极力期盼“群众运动”的到来。这是五四运动后思想界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上海中国公学教员于1919年11月创办《新群》月刊,在发表的《群众运动与中国之社会改造》文章中,直接使用“群众运动”这个词,不仅主张中国的社会改造必须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且还认为“只要群众有联合的精神,就是资产阶级和军阀政治都可一一推翻,无论什么黑暗的势力

都可扫除的”。<sup>[76]</sup>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也有文章总结1919年10月间北京、天津学生向北洋政府请愿失败的教训,认为是“方法错了”,单是“少数牺牲”,没有“群众运动”,因而今后从汲取教训的角度,就必须发动“有系统”“有组织”“同一目的”“一致行动”的群众运动,将“上至于学生、教员、校长、报馆、商人,下至于叫卖要物的、拖黄包车的、挑水的、帮运货物的”等等都组织起来,并由小组织联合为大组织,进而成立“真正民意机关”。<sup>[77]</sup>这里,对于“群众运动”的看法已经突破了仅仅是运动规模很大的认知,而是进至加强各阶级动员并进而建立政治组织的阶段。当时已有不少进步青年在行动上为促进“群众运动时代”的到来而努力,并在话语认知上有显著的变化。可以说,在1920年的五四运动一周年的前后,此种情形更为突出。《新青年》在1920年5月发表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文章,期待着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到来:“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sup>[78]</sup>事实上,1920年的中国劳动界、知识界在“五一”劳动节时已经行动起来,进行了不少的庆祝活动和舆论宣传工作,在社会上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李大钊此时还是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并表示引以为憾,这亦可见李大钊对于更为猛烈、更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的热切期待。《杭州学生联合会报》在1920年5月出了五四运动一周年的专号,其中有一篇题为《庆祝“五四纪念”的真意义》的文章,突出地指明五四运动的“群众运动”性质和思想解放上的意义,指出:“五四运动,开中国群众运动的新纪元,是从多数国民的觉悟里发生出来的,是中国国民思想解放的一个真切表现,是人类——不是说全人类——自己求自己解脱的发端。不用说是中国国民的一个大纪念日,就连世界全人类也未始没有拿来作纪念日的价值的。”<sup>[79]</sup>这里,称“五四运动”是“开中国群众运动的新纪元”,这是就五四运动具有“群众运动”性质并表征其群众运动价值的最好表达。也是在1920年,有个叫业裕的读者致信恽代英,希望他主持的利群书社能够最大限度地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并由此而积极地“从事于大群众的运动”,尤其需要特别重视和利用“群众心理”。在业裕看来,“改造社会是谋劳动者(兵包在内)的幸福”,而“社会上只有劳动者最多,所以很不得他们的帮助”,这就需要研究并“投合群众心理”,如此那些“靠着劳动者过活的军阀、财阀,不推自倒”,则社会改造事业也就没有不“成功的”。<sup>[80]</sup>施存统当时的思想比恽代英还要激进一些,他是以“革命”来诠释“群众运动”的。他在1921年3月给宋介的信中,一方面表示自己对于《曙光》的进步“很佩服”且“十分满意”,尤其是赞赏《曙光》业已达到“赤色十分浓厚”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提出学生办杂志必须重视“劳动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这就需要先对学生这个群体进行宣传,然后让“学生帮助劳动者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要靠学生和劳动者共同担负的。现在对学生的宣传,就是叫学生帮助劳动者革命。我很希望你们努力对学生界宣传!”<sup>[81]</sup>不难看出,施存统极力主张青年学生创办进步刊物,并藉以通过刊物形式进行民众运动的宣传,推动群众性的“中国革命”时代的到来。

3. “新社会”观念。“新社会”在社会变革时代乃是新生代的理想追求,与社会价值观的创新和提升是分不开的。在五四时期的话语中,劳动者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社会”,而劳动本身就在于创造新社会,故而“劳动”范畴嵌入思想界后也就必然地要实现劳动者的“新社会”诉求。在五四时期的变革时代,“社会改造”最终乃是指向“新社会”这个目标,尽管人们对于何者为“新社会”以及“新社会”有着怎样的新内涵,在认识上及思想言说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新社会”理想则是确定不移的追求目标,并且是社会演进中真善美的理想状态。关于何谓“新社会”,陈独秀在1919年11月撰写的《本志宣言》中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

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sup>[82]</sup>其后,陈独秀又说:“我相信社会经济制度果然能够改变,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不被一班好吃懒做的人抢去,那时便能达到孔子‘均无贫’的理想。因为贫富是比较的现象,缺乏乃是对于不缺乏相形见绌的情况,分配果然平均,那里会有贫的现象?”<sup>[83]</sup>不难看出,陈独秀对“新社会”的解读是与“新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即“新社会”就是“新时代”,一切善的、美的、真的皆为“新社会”所具有,因而“新社会”是积极的、进步的理想状态,是经过“社会经济制度”根本变革之后的“分配平均”的“新社会”,同时也是人们投身“社会改造”之中而努力追求的目标。《曙光》杂志所说的“新社会”,乃是依据其所崇尚的“科学”精神来建构的具有“真善美”的“新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的改造就不能抛开科学”,<sup>[84]</sup>而“欲谋社会精神物质两种生活的发展,是不可不先谋科学的发展的”,<sup>[85]</sup>故而提出“果能本着科学的精神来改造社会,社会总可以由不真不善不美,进到较真较善较美;由较真较善较美,进到更真更善更美的地位”。<sup>[86]</sup>1919年11月创刊的《新社会》,更是将社会改造的目标“新社会”作为该刊的名字,其发刊词明白地说:“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等幸福的新社会。”<sup>[87]</sup>1920年4月新人社在上海创办的《新人》月刊,固然在于谋求如何才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但也有其“新社会”的期待,故而主张“用和平的手段,去占领我们所要求的空间,建设我们所要求的社会”。<sup>[88]</sup>新人社的所谓“新社会”就是理想中的新村。如该刊发表蔡晓舟的《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文章认为,这种新村就是“幸福均沾的社会”,“就是使社会中个个的分子,都能得着平均发展个性的机会;使他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碰不着什么障碍”,为此就要采取“强权转移的运动”来获得强权,等到“强权既移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旧社会上一切的坏现象,自然会都没有了”。<sup>[89]</sup>当然,“新社会”目标的具体内涵在当时的思想言说中存在很大的歧异,这大致源自人们对于社会改造问题有着不同的理想、不同的追求。时人业已注意到,在社会改造之中存在着“怎样改造的理想还是各自不同”的,故而最终所要达到“新社会”的目标也就不同。“有的会悬个军国主义做目标,有的会悬个资本主义做目标,有的会悬个平民主义做目标”,即使是“同一自信是平民主义的人,各人所相信的,还有种种程度的差异”。<sup>[90]</sup>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社会改造”的理想皆是必须的,因为“凡人要与社会做点实在的事,都不可不树立一个改造的理想,使多数人在这一致的理想之下分途努力”。<sup>[91]</sup>但如何能够造成“一致的理想”,也就成为“社会改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当然也就关涉到社会改造中所遵循的“主义”问题。如宋介就希望能够从“主义”的辨析和选择之中,通向寻求未来“新社会”的道路,故而他说:“现社会既倒之后,应当再有一种什么社会发生,我也不敢预言,但我所知的是:社会是因人而存在,人不能因社会而牺牲,若社会既经人发现出不合理来,就应当改造他,决不能姑息他,反把人来摧残了,这就是我的大主张。至于其他种种主义里头的那些将来的社会,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清楚,究竟是那一种最好,宜于作建造新社会的图样,就拿他作图样。”<sup>[92]</sup>这大致可以说,时人认知中的“新社会”当然是“社会改造”活动的产物,这其中亦有以人们所各自高悬的“社会改造”的理想目标为价值导向,同时也是与人们在“社会改造”中对“主义”的选择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进而言之,“新社会”范畴在五四时期的提出,还在于对现有社会的严重不满,亦即认为现有社会不是“新社会”,而只是“旧社会”的范畴。故而,五四时期“新社会”范畴的提出,总是与对“旧社会”的认知、批判及超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国民》上有人不同意以“调和”新旧的办法来建设“新社会”,而是认为“新社会”是要在“改革”中才能建立起来,并且“破坏与建设,同为



改革之要素也”，而在新旧不能相容的情况下更需要先破而后立，“故居今日而欲言改革，非以大刀阔斧，破坏旧日社会上遗传之信条，大声而疾呼，直捣其受病之处，使之赤裸裸的而为新观念之涵养，新生命之追求，则黄雾漫空，阴风匝地，欲拨云雾而见青天，安可期也，安可期也。”<sup>[93]</sup>这种激进的“新社会”思想，因为主张“破坏”的手段，因而也就孕育着社会革命的因素。总体来看，“新社会”主张在五四时期的提出，不仅反映出劳动者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而且也反映出思想界有着超越现实梦想精神以及对未来勇于追寻的理想信念。

4. “社会主义”观念。随着五四时期思想重心的下移及激进化的态势，理想的“新社会”最终落在社会主义目标上，而社会主义这个“新社会”目标最终地与“劳动”发生关联，也就成为五四思想界的重要表征。《星期日》主张依据社会主义目标、阶级斗争手段来解决“劳动问题”，直接说“就是废止资本私有财产制度，以共有财产制度为社会的基础。要是私有财产不能变更吗？社会的生产形态和私人所有形态的冲突，是不会停止的，那么劳动问题也不能有合理的解决”。<sup>[94]</sup>在五四时期的话语体系中，理想中的“新社会”是与社会主义的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亦即“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在1920年的一篇文章中，对于“新社会”的社会主义前景就有这样的描绘：“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制造出来的货物，一部分作为下次再行制造的资料；一部分作为社会的财产；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大家享用。这时候大家都要作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资本家也变为劳动者了。大家都享自由，都得平等。这是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sup>[95]</sup>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中，“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内容极为丰富：

其一，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主义理想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呈现的，而社会主义只能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这自然是以“劳动者”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为前提。因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制造出来的货物，一部分作为下次再行制造的资料，一部分作为社会的财产，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大家享用。这时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sup>[96]</sup>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部分人看来，不仅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资本家生产制”已经面临着“灭亡的浩劫”，而且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动者在“资本家生产制”之中亦“得着一个受共同训练、过共同生活、有共同利益的机会。……有了这一个机会，于是在‘平等的自由团结’里面，要求‘平等的自由幸福’，建设以平等、自由、互助为基础的新社会，这一个全世界人类一致协同的新要求，就由全世界劳动阶级的人，一致协力地活动起来了”。<sup>[97]</sup>故而，未来的“新社会”既然以劳动为本位，也就成为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并且这个“新社会”乃是随着“劳动阶级”的出现及“社会革命”的努力而出现的，因而这个“新社会”也是由“劳动阶级”所主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可见，社会主义既然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故而社会主义作为中国人未来的“新社会”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超越。

其二，社会主义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劳动阶级”所追寻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新社会”，因而也是要谋求实业的振兴，但这是以社会革命及政权的取得为前提的。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时就认为，在是否发展实业的问题上，“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问题，要大刀阔斧地来主张共产革命。革命未成以先，一切罢工，减时，加薪，自治，国有，协作等事件，都不过被视为训练劳动群众帮助革命进行的种种手段，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

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为政权在一个生产阶级手中掌着,并且要消灭阶级界限,所以只有共同的生产者,将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分别,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分别了。劳动者是无祖国的,所以乃能联合起全世界的劳动者来消灭这个竞争和侵略的野心,而产生共同生产的大计划。共产主义发达实业之大计在此,由此乃能使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得以实现,科学为全人类效力,而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sup>[98]</sup>周恩来的论述,不仅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具体路径,而且构建一幅生产力发达、产业集中、大规模生产的“新社会”蓝图。

其三,社会主义有依据生产力状况的分配制度。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有既定的历史前提,要依据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决定分配方式,不可能立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理想的状况“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共产党》月刊上有文章说:“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遭了。”<sup>[99]</sup>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不仅提出依据社会生产力状况来决定分配方法,而且也阐发了生产力与分配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其实就是要求“新社会”的社会主义能够建立在切合现实的基础上。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时期的“新社会”最终落实在社会主义的目标上,但作为理想蓝图的“社会主义”与作为行动方案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作为理想蓝图的“社会主义”具有思想性、目标性、未来性的特点,而作为行动方案的“社会主义”有着实践性、操作性、现实性的特点。故而,如何在劳动者的社会革命之中分辨和调适“新社会”的理想性和现实性也就更加迫切了。

五四时期“劳动”范畴得以成功地嵌入思想界,有着“劳工神圣”的语境为其思想导引,但根本上说,乃是成就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引入中所引起的“劳动”范畴在价值观层面的突出变化,故而能够从“劳动”范畴进而衍化出“劳动阶级”范畴。在“劳动”所构建的“劳动阶级”话语中,“群众”“群众运动”“新社会”“社会主义”等观念应运而生,成为构建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想体系的基本单元,并使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想在重心下移中呈现出激进化的演进态势。可见,五四时期社会思想演进尽管多因杂陈、脉络交叉、复杂多变,但亦有着以“劳动”为底线而逐步展开的内在逻辑,这自然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突出反映,同时又与早期新文化运动由“个人解放”进至为“社会改造”的历史阶段密切相连,并且还有着外在的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和内在的五四运动的有力推动。

#### 注释:

[1]《觉社新刊发刊的旨趣》(1920年4月15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69页。

[2]据笔者查阅中国知网近20年的论文,学术界对“劳动”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的应用性研究,侧重于研究社会中的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劳动权益、劳动保障等问题;二是劳动的理论性研究,主要研究和阐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意蕴。代表性成果有杨学功的《“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观念》(《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王朝辉的《“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梁雪的《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几个错误理解的批判》(《改革与开放》2011年第12期)等。截至目前,尚未见有从思想观念史角度专门研究“劳动”范畴如何嵌入中国思想界,又如何影响现代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成果。

[3]劳动:《劳动者言》,《劳动》第1号,1918年3月20日。

[4]《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69页。

- [5]许怡、叶欣:《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3期。
- [6]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 [7]蔡元培所界定的“劳工”在内容上过于广泛,他所说的“商”显然不是“劳工”之“工”,至于他说的“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等,更不是“劳工”之“工”了。从后“五四”的思想史来看,蔡氏的这个关于“劳工”范围的认知,并没有被思想界、学术界所认可和接纳。
- [8]《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
- [9][10]劳动:《劳动节》,《劳动》第3号,1918年5月20日。
- [11][78]《“五一”(May Day)运动史》(1920年5月),《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5-517、245页。
- [12]高尚德:《“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 [13][14]朱谦之:《劳动节的祝词》,《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 [15]《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1920年9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页。
- [16]《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 [17][18]《发刊词》,《工学》第2卷第1号,1922年5月。
- [19]劳人:《尊劳》,《劳动》第1号,1918年3月20日。
- [20][21]《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8-439、439页。
- [22]《本校第一、第二劳动团共同宣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第2号,1919年10月20日。
- [23][24][26]《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25、4、280页。
- [25][72][8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158、40-41页。
- [27][29]我亦工人:《劳动者呵!》,《劳动者》第1号,1920年10月3日。
- [28]不息:《告工人》,《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
- [30]劳人:《最趋时的三件宝贝》,《劳动者》第8号,1921年1月2日。
- [31]陈为人:《我们的劳动力哪里去了?》,《劳动界》第14册,1921年11月14日。
- [32][40]汉俊:《金钱和劳动》,《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 [33]蓝仲尊:《生活的根本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15日。
- [34]谢婴白:《国际劳工运动论》,《闽星》第1卷第2号,1919年12月4日。
- [35]任社同人:《责任的发现》,《责任》第1期,1922年11月27日。
- [36]KS:《现在的社会》,《责任》第15期,1923年3月19日。
- [37][38]绍斋:《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艺术讲演会”的感言(续)》,《星期日》第23号,1919年12月14日。
- [39]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
- [41]《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时代》第1号,1923年4月10日。
- [42]华林:《社会百话之一:劳工可责》,《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7月20日。
- [43]苏芬:《关于中学校几个问题》,《新江西》第1卷1号,1921年5月1日。
- [44]《王统照复路汝悌》,《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4-55页。
- [45]凌霜:《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劳动》第4号,1918年6月20日。
- [46][56]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95、464页。
- [47][49]石樵:《工会宗旨趣书(二)》,《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07、505-506页。
- [48]周馨:《工会的宗旨趣书(一)》,《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01-504页。
- [50]《工读主义》,《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 [51]王光新:《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14页。
- [52]香浒:《“长衫”应届末日》,《民风》第13号,1919年8月17日。
- [53]黄天俊:《我的工学主义观》,《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2号,1920年1月11日。
- [54]张强:《破除社会的阶级》,《新学报》第1号,1920年1月。
- [55]赖汝梅:《自治半月刊宣言》(1920年6月1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479页。
- [57]峻霄:《本刊今后的趋向和任务》,《新民意报副刊》第8册,1923年8月1日。

[58]《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1922年8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59]《告做劳动运动的人》(1922年5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60][61]《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62][63]《谈政治》(1920年9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8、164页。

[64]陈独秀:《发刊词》,《伙友》第1册,1920年10月10日。

[65]玄庐:《强盗的奴隶》,《伙友》第4册,1920年10月31日。

[66]谷剑尘:《工商伙友同病相怜》,《伙友》第3册,1920年10月24日。

[67]“智识阶级”和“知识阶级”这两个范畴在五四时期是相互通用的,就使用的大致情形来看,尚未发现两者有何实质性的差异。知识分子本身只是一个阶层,并不是一个阶级,因而也就不具有独立性的地位,但为何却在五四时期“赋予”其阶级的身份,而成为“知识阶级”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知识分子阶层何以变成“知识阶级”问题,目前大致可以说明三点:一是阶级的观点业已渗入思想体系之中,使得“知识”此时能够与“阶级”结缘;二是表征出此时的知识分子正努力寻求其自身在社会上的独立性,以便与社会上的其他阶级能够平起平坐,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一定的位置;三是透露出知识分子由知识界、思想文化界跨入政治界的政治诉求,藉以在社会变革中获得参与的机会,进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社会的走向。

[68]《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69]傅彬然:《改革本会会报的意见》,《杭州学生联合会报》第19期,1919年11月30日。

[70]独秀:《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劳动周报》(广州)第6期,1923年5月19日。

[71]谭平山:《世界军阀的末日》(1920年),《谭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77页。

[73]宋介:《社会的自由》,《曙光》1卷2号,1919年12月。

[74]《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7页。

[75]玄庐:《前途的灯》,《星期评论》第11号,1919年8月17日。

[76]杨亦曾:《群众运动与中国之社会改造》,《新群》第1卷第3号,1920年。

[77]倪亮女士:《现在我们怎样进行的研究》,《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30日。

[79]尧孙:《庆祝“五四纪念”的真意义》,《杭州学生联合会报》第31期,1920年5月2日。

[80]《业裕致代英》,《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67页。

[81]《施存统致宋介》,《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66页。

[83]《自杀论》(1920年1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84][86][92]宋介:《科学与社会》,《曙光》1卷1号,1919年11月1日。

[85]《剑三给范煜燧、李树峻的信》,《曙光》1卷1号,1919年11月1日。“剑三”为王统照(1897-1957)的字。——引者注。

[87]《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

[88]同人:《新入约》,《新人》第1号,1920年4月3日。

[89]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新人》第4号,1920年8月18日。

[90][91]《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4、295页。

[93]邦式:《改革之手段》,《国民》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1日。

[94]今是:《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星期日》第22号,1919年12月7日。

[95]《劳动者与社会主义》(1920年),《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1页。

[96]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1日。

[97]季陶:《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劳动界》第10册,1920年10月17日。

[98]伍豪:《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2期,1922年9月1日。

[99]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

[责任编辑:陶婷婷]